



美国哥伦比亚访问学者王书君先生传记纪实力作！

书中以张学良的口述为线索，张氏随兴而谈，随意而至，细碎生动，趣味盎然！

张学良的 / 自 / 传 今生今世上

口述 张学良 序文 唐德刚 撰编 王书君

团结出版社

张学良的 今生今世

作者 张学良 序文 唐德刚 撰编 王书君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学良的今生今世/王书君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80214-911-3

I. ①张… II. ①王… III. ①张学良(1901~2001)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5247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装订: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170×230 (毫米) 1/16

印张: 33.75

字数: 483 千字

版次: 2011 年 4 月 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14-911-3/K·547

定价: 58.00 元 (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

唐德刚

张学良将军是中国现代史（甚至是世界现代史）上，一个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点，便是他一手主导的“西安事变”。没个西安事变，当今中国，甚至整个今日世界的局势，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正因为这一局面的出现，他这个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历史家就很难下其定论了。是之者会说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又会说他是不知敌我情势，搞政变误国的乱臣贼子。至于半是半非，乃至三七开，二八开……今后千年的历史学家，显然对他也不会有个一致的定论。

最可笑的还是张将军自己。他对他自己所发动的“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评，也是是非不定的，虽然他在口头上还是一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这是他亲口向我说的，但是他也认真地说，他如是蒋，他会把他自己枪毙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干出这桩犯上作乱的事件，他自己早就把他们枪毙了。因此，他被蒋关了半个世纪，不但无怨无尤，蒋在他心目中，始终还是个“亲如骨肉”、抗日救国的统帅，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无定论

像张少帅这样罗曼蒂克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当他还在关押期间，不能自由行动之时，像在下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梦想过和他去拉上关

系，或是来替他写本传记。就连访问他一下，笔者也从未作此梦想。可是天下事，有时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机缘巧合吧，少帅在其垂暮之年——已经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龄——他竟然躬自下访，和不才大为盘桓了一阵子。不但我被邀请作其座上客，他正式约我为他写传，他也曾到新泽西州，下访寒舍，做我的贵宾……那也是我迁居到敝庐现址之后，最享名世界的宾客了。

张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缘分呢？外界误传甚多，虽不值一驳，但是此事经过的本身，倒不妨略叙一下，也算是史学界的一宗真实的小掌故吧。请先从“沈阳事变”说起：

在上一世纪，30年代之初，当他对日本侵略我东北，以其“不抵抗主义”来应付“九一八”事变（1931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个才略懂国事的小学生。我记得那时我们到街上游行，大呼“打倒张学良，打倒赵四小姐”的口号，每忆至此热泪横流。那也是我生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破题儿第一遭。真把张学良这个“军阀”恨得牙痒痒的。其后“西安事变”爆发（1936年），我已是一个颇懂时事的中学生。这时我对张学良倒反而有些同情与崇拜之心。其后年纪渐长，尤其是在美国大学，对中西各族学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张学良”这个历史名词，在我的课堂里，时正时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几次身，而说不出个定论来……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结论。经过数十年的反复思考与观察，我对这段中国近代史，才恍然有悟——这不是一两个历史学家的问题，这是历史学上一个永远解决不了的是非问题。这个是非问题，恐怕在今后一千年的中国史学界，也会争辩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势将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永无定论的问题。

张公有意下访

在我个人来说，做个历史的执笔人，在经过三四十年对此一问题的教与学，我自觉对张少帅的故事已有个粗浅的认识。在退休之后，正有心预备对这段中国历史考虑如何下笔之时，真是无巧不成书，少帅这时也正在

托人找我。首先他委托他的晚辈和助手王一方君来找我。一方不认识我，但是一方有个同学兼好友郭冠英，则是我在纽约认识的小老弟。一方乃改托郭君到纽约来找我。这是1989年秋冬之交的事。这居然又是一个巧合，因为此时我正在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参加个学术会议，会后高雄佛光山长老星云大师，也正约我和刘绍唐先生一同去访问佛光山，并作点学术报告，有关在公元五世纪末期，一个中国和尚慧深，可能去过美洲传道的小考证。

这时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挂电话到佛光山，把张公翌晨的邀请转报于我。我本想请他换个日期，但是郭君和刘绍唐都劝我不要改动，因为张少帅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请一次客至为不易。我受邀请还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样向星云和尚交代呢？绍唐说此事由他来解决。他乃向星云说，我有急事非立刻飞回台北不可。

星云是个最通情达理的大和尚，他不问情由，便招呼庙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飞回台北不可。此时飞机已客满，但是佛光山招待所还是帮我二人挤出两张票来。绍唐和我乃于1990年1月3日星期三清晨，匆忙地飞回台北。

初晤九十岁的少帅

紧急飞回台北之后，绍唐把我送到“来来饭店”便径自回去了。刘去未几，郭冠英也匆忙地赶来。我们乃按指定时间，乘电梯上到指定的楼层。当我们步出电梯时，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却又不像是饭店雇员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说：“本楼今天不开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纸条，说：“我是应约而来的嘛。”

“谁约你的？”他问。

“一位张先生。”

“您贵姓？”他又问。

“姓唐。”我说。

“您是唐德刚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并说：“张先生正在等您呢。”说着，他便领我二人到一单间的餐室，室外还另有两位便衣人员在走动。他们彼此微笑一下，这人便打开餐室的门，申报说：“唐教授来了。”顺手关了门，他便在餐室的门外了。

我举目一看，这餐室相当大。餐桌之外还有沙发和其他设备，足够十来个人用餐。沙发上正坐着一老一少在谈话，那年长的戴着黑眼镜和毛线小帽，那显然就是张将军。他站起来，脱下毛线帽，和我亲切地握手，连说：“欢迎，欢迎。”站在他身边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报说：“我是王一方。”郭君和他们原是熟人，就不用介绍了。

张学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见到张氏这样的历史人物，我倒有点矜持呢。谁知张公对我则像个数十年的老友，久别重逢一样，不拘形迹地高谈阔论起来。使我也为之全部放松，跟他有说有笑。

我们谈了些题外之言后，张公便言归正传地告诉我说，他之所以特地约我来相会，是他曾看过我的两部书，十分欣赏。一部是《李宗仁回忆录》，他说那部书写得好，好在何处呢？他说他未见过李宗仁，但是他和“蒋”太熟了。你笔下所写，李宗仁所说的“蒋”，就是百分之百的“蒋”，因为“蒋”正是这样的人。张公连连夸奖我“写得好，写得好”，并翘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释说，其实李传只是个未完成的草稿，由于传主的突然回国，就无法润色了。这部回忆录的复杂故事和执笔者的辛酸原是说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细说了。

另一部书呢？——原来那只是一篇短文，讨论他自己的，叫做《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他说写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写得好。”好在何处呢？张公说，别人所写他和“老师”（张作霖）的关系，只是父子而已，你说我们父子俩不只是父子而已，我们父子是不同的两代人——父亲是绿林出身的旧军阀，而我则是新式军校出身的青年将领……我们虽是

骨肉父子，而作风和心理，都有极大的区别。“这一点，你讲得好，也讲对了。”他又翘起大拇指来，连声称赞。

他说得我大为惊奇，我什么时候写过这篇文章呢？经他解释，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学生傅女士的博士论文的汉译本所写的序言。这汉译本原计划在内地出版。因为那时两岸的新闻界尚不太沟通，我这篇序文乃被台湾报纸斩头去尾，并另取个文题，成为一篇讨论张学良的独立的文章，在台湾发表的。我自己还不知此文的存在，却被张公看到了。

言归正传，张公说，他也想写一部像“中英两文”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书，并希望我能考虑执笔，云云。

“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

他这番话说得我大为惊奇和感动。因为这正是我采用我自己的历史哲学所写的书。我认为一部中国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现代化的“转型史”——那也就是，千年不变的“传统中国”，在鸦片战争（1842年）后忽然开始“十年一变”，渐次变成个“现代中国”来。就说西南地区吧，从陆荣廷变到李宗仁。前者便是个旧式的军阀，后者则是个有现代思想和现代训练的革命军人。所以前者便被后者取代了。

东北情形，亦复如此。上一代的旧式军阀被下一代的革命军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东北，则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它们在现代中国的政治“转型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则是大致相同的。这宗历史自动“转型”的现象——也可以说，是历史人物的“主观意志”敌不过历史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吧。

女大十八变，现代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大致已变了十五六次了。如无意外发生，中国再变三两次，大致就可变出个“定型”来……通过目前这一惊涛骇浪的“历史三峡”之后，再向前走，自然会风平浪静！其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整个中国现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个“历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个人对今后中国的历史发展，是甚为乐观的。

上面这一段谬论，也可说是我个人治中国现代史数十年观察所累积的私家的“历史哲学”吧。平时不敢乱事宣扬，只在自己论史的著作里（如拙著《晚清七十年》）和课堂里偶尔提提罢了。史学界不同意的专家们在读后大摇其头的，多着呢。想不到我这番谬论，竟被张少帅所看中，他也算是个难得的知音吧。

拿笔杆和拿枪杆的区别

6

他又强调，他目前也想写一部中英两文的《张学良回忆录》。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执笔人了。画龙点睛，真使我受宠若惊。刘绍唐原先也就猜出张公找我的目的，并一再“预约”由他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张公虽然说得很诚恳，也很轻松。但他这一要求，对我却引起了极大的心理震撼。老实说，《李宗仁回忆录》这部书可把我整惨了。它几乎把我整到栖身无所、啖饭无门的绝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专文纪录我受难的经过（见中文版李传诸近版序言）。俗语说：“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草绳。”目前这条大“草绳”，真使我心惊胆怕。其牵涉之广，问题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当其冲的过来人不知也。

就以最简单一项来说吧，这部中英两文上百万言的巨著，非执笔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执笔人和传主是当今世界上绝对不同的两种人。他二人背景、个性、训练、任务和经验，都绝对不同……总之，他二人是两种不同的人。尤其是传主，像李宗仁和张学良，他们都是拿指挥刀的人，把发号施令、绝对服从视为当然的。可是一旦误入学术界，他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张学良这种做了一辈子总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转头来，让别人指挥他——尤其是让一个无名小卒来指挥他——接受以“笔杆来指挥枪杆”这个现实，其受委屈之心，终日彷徨不服的惨状，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枪杆的人，如果未受过严格训练，是要打败仗的；拿笔杆子的人亦然也。他们如未经严格训练，而乱拿笔杆，其结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话的。张少帅后来，终于以拿枪杆方式来拿笔杆，而出了天大笑话，也是必然的后果而已。言之可叹。

这种大工程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但是在张少帅见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说这些话。说出来他也不会相信的，我只反复地解释，工程如何之大，困难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纪也大了，负担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发现，此话也不能多说；说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侧重在工作方面，这种大工程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国或美国寻觅一个第一流大学作赞助机关；另外还要向第一流的基金会申请至少10万美元以上的研究费，组织一个完善的研究计划，聘请合适的、精通中英双语的历史研究员，并组织个内行专家的赞助机构，来加以赞助和监督，而限期完成之。

但是这项研究工作，谈何容易？哥伦比亚大学是这一行道的老祖宗，誉满全球，而谤亦随之。其“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双语的《李宗仁回忆录》，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项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语，没有汉语的《顾维钧回忆录》，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陈立夫、孔祥熙、张发奎、胡适、吴国桢等人，就被冷落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是非姑且不谈，但是他们都是制造历史的要人。没有他们真实的传记史料，一部民国史是写不下去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曾为此敦请过他们，不幸他们工作经年，最后都是半途而废了。至于困难何在呢？那就说来话长，且举三个小例子，以见其余。

陈立夫、孔祥熙、张发奎

其中尤其是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的陈立夫先生，他在20世纪50年代被台湾当权派放逐到美洲来，开鸡场做难民，心怀不平。他要把他盛时的功业和败后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来，不吐不快。陈氏因而应约在哥大口述历史学部，盘桓了好几年，说尽了他的一党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彩，但是最后还是一张白纸。

陈曾到哥大亲自来吵闹一番，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后他才另起炉

灶，自己执笔，从头来过。这部后来在台北完成的书，就是另一部书了。他曾把这一手稿交与我，要我审评并译成英文。我知难婉拒，并介绍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劳。这便是后来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的《陈立夫回忆录》了。但这部在台湾撰写的回忆录，与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两部书了！

当年经哥大邀请的国民党时代军政要人，还有孔祥熙、张发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国的摩根、财神菩萨，更是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连襟，因此他们在岳家相聚时，孙中山、蒋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国史上，不论是好是坏，其重要性就不用谈了。

张发奎在北伐期间，曾是贺龙、叶挺、朱德、林彪的上级指挥官。历史学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动世界的“人民解放军”的来龙去脉，还要从张发奎说起呢。张也为此颇为自豪而健谈。不幸孔、张二人的回忆录，也都因问题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阁。

口述历史与著述历史之异同

笔者不惮其烦而写出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释搞口述历史的困难。它不是像张学良这样的历史人物所想象的“我讲你写”就成了。其实它的实际工作，比起一般历史的写作，更为艰苦。何也？因为一般史书的写作，只是根据各种史料，按图索骥，写其“书”而已矣。搞口述历史就要多一层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学的著述程序之外，还要加上当事人有关键性的“口述”，而这种口述，往往是画龙点睛，与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举一个陈立夫“口述”的小故事为例：

在抗战开始前，陈奉蒋密令，以国民党组织部长身份远赴西欧，候命绕道去莫斯科争取苏联援助。他密赴西欧，一住经月，苏联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国，回国后，竟“因功”升任“国府委员”。

“陈伯，”我说，“那是当时中国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说：“我因功升入养老院。”

原来这是当年国民党中“政学系”官僚所导演，离间他们蒋、陈关系

的一幕最精彩的演出。“蒋家天下陈家党”，可能也是他们叫出来的，事缘起某次国民党中央的选举上，陈立夫得票居然比蒋还多出几票，虽然蒋中正的“正”字也被监票人当成五票数了进去。蒋一见此选举结果，顿时大怒，竟举起台上的木椅，向陈立夫砸了过去。其实，这只是政学系一桩高明的阴谋，来离间他们蒋、陈的关系而已，当我把这一真实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陈公请益时，陈还含笑地说，这不是阴谋，是他当时的确比蒋在党内更得人心！

无论怎样，陈从欧洲回来，国民党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说他自己被调离组织部，“升官”成“国府委员”，他手下的得力干部也大半调差了。只有朱家骅被升成部长。朱原是陈立夫的副手，现在就变成他的政敌了。抗战期间，陈被调任教育部长，CC系在党内的力量就一分为二，从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往往为“著述历史”所不能及。司马迁的《史记》中很多精彩的章节，都是根据口述历史写成的——这本是我国史学上的老传统，并不是现代洋人发明的。只是搞口述历史要特别小心罢了。你如碰到政学系里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听偏信，像蒋介石和陈立夫那样，拿椅子砸人！

一辈子没个上司

当我把这些小故事向张少帅以谈笑方式简略地说了之后，我发现他半信半疑，把它当成“耳边风”。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说他那一套。我对他这司令官的态度不以为异。因为我有为李宗仁工作的经验，把个一级上将训练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是有充分的经验的，只是我第一天就发现，张学良比李宗仁还要难缠得多。因为他自以为是的个性，比李宗仁还要坚强十倍呢。

张学良先生告诉我说，他的弱点是他一辈子未曾有过“上司”。

“老师不是您的上司吗？”我说。

“他是我的父亲，”他说，“父亲究竟与上司不同。”

“蒋不是您的上司吗？”我又问。

“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他说着哈哈地大笑一阵。据张公透露，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了一个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的计划，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将军告诉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

10 在他口中，震惊天下的“西安事变”，就是这样的“先抓起来再说”的“干起来了”！

我告诉张汉公，“西安事变”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呀！

“就是这么干起来的。”他认真地说，“别人都在胡说。”说后他又哈哈大笑。

张传不能轻易动笔

在我和张公直接接触之前，数十年来，我都认为能干出“西安事变”这样大计划的人，一定是工于心计，老谋深算；谁知他竟是这样一个任性而冲动的人物。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但是我对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却未因此而前后易辙——他在中国历史上，将永远是个是非不定的人物。

随后我们又言归正传，张公还是要我考虑替他写一部李宗仁式的回忆录。我虽然内心也觉得值得一写，但是我还是诚恳地告诉他有关工作量和年龄的问题，事实上当今能以中英双语为他写自传的历史学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认识罢了。

我诚恳地问他：台湾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他只是摇摇头，意思是，在台湾这个地方，替他写传记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笔，还是美国好。那我就向他建议，就仿照李宗仁的办法，将来由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其事。

因此我们又言归正传，我估计写他那样一本双语传记，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计划、专任研究员和专任或兼职助理，有专用研究

室，有足够的参考图书，最好还要有专家组织的顾问和襄赞委员会。动手之前，至少要有现成美金10万、20万的基金，这都是一个一流大学的专门计划；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一个人可以干得了的。

我这一番话说得他似乎将信将疑，我可以体会出他内心一定在想，写本小书有这么困难吗？他和其他外行人一样，一定以为写本“回忆录”正如他一再说的，“我讲你写”就成了。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难是实际工作体验出来的，未吃过苦头的人是永远不会相信的。这就是所谓内行外行之别了。因此张公一再地说：“还是你就照李宗仁传的办法，写写看嘛！”我内心立刻的反应，便是绝对不能“写写看”！经验告诉我，没有哪个张三替李四写传，李四会感到满意的，尤其是张三是内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极难一致的。

且举个经验上的小例子：

《李宗仁回忆录》的教训

在我和李宗仁将军工作之初，“李排长”曾向我大谈其天下国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变起来的。我就劝他多谈谈“炒排骨”（当排长）的经验和故事，暂时少谈当时的天下国家大事。因为一个李排长当时能知道多少军国大事呢？这时李公心怀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观色的。后来李排长做了上将司令长官了，他又同我大谈其二战期间英美对大战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们对同盟国的政策也应该如何如何以为因应，要我详细地记下来，算是他对国际局势的分析。我很客气地问他说：“德公呀！您这些国际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在抗战中期，他以五战区司令长官身份，回重庆述职，参加中央纪念周，“听孙科说的”。我又问李德公，“孙科的话就可以一言九鼎吗？”他信心开始动摇了。

“我怕全部记下来，在将来的国际版上会引起笑话呢。”我又补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诉我，连说：“抽掉，抽掉！”

我在中国抗战时期曾当过上尉；李公当时是“一级上将”。但是隔行如隔山，写历史，上将就只好听上尉指挥了。

在和张学良说话时，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张谦虚多了。毕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张少帅，一离开军校就当上将官呢！说句行道话，李在撰写自传上是个可塑之材。但是从第一天开始，要把张在学术上训练成一个历史学徒，我实在无此信心，也看不出远景来。

你“又”错了哎！

12

张将军也告诉我一桩关于他信教的故事：

被关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对宗教发生了兴趣，他最早的兴趣是佛教，并看了些佛经，自觉颇有心得。早年在台湾山区，某次蒋夫人来看他，发现他对佛教有了兴趣，就说：“汉卿哪，你又错了哎！”

“为什么我‘又’错了哎？”张公笑着说，“她的意思是说我已经上过共产党的当，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当。”她说她要领导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这项导引是做对了，首先是赵四小姐被感化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渐渐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

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诚恳地说，他的整个生命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基督教是不准有多妻制的，我得有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离婚，再和‘现在的太太’结婚。”

他又说，他夫人现在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极力反对写什么回忆录，这样那样的。但是张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写回忆录，不是为着搞什么“辩冤白谤”；写回忆录只是替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说罢了。

张少帅这一席话，说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还是说，他的回忆录是应该写的，但是工程浩大，决不是我这个七十老翁可以干得了的。

“那你就开个头嘛。”他说，“以后我们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样，找哥伦比亚大学……”

他说这话，我知道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建议的，我也知道他心里会在想，“写一部回忆录……‘我讲你写’，有什么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说，他以后要请我到他家去，把这事好好谈谈。并坚持要我“开个头”，

以后再从长计议。

张汉公和我一谈就是三个小时，主要是我二人对谈。王一方和郭冠英在一旁只是略微帮腔，并照了好多相。我觉得应该是他睡午觉的时候了，虽然他还有说不尽的故事，而毫无倦容。最后还是我坚持他应该回家休息，王一方也作了相同的建议。我要陪他一起下楼去。张公却示意要我先走，因为“门外还有人”。

这是张学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见面。我个人在大学课堂里谈了三四十年的张学良了，这次才见到一个与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张学良”，但是我对他在历史上的结论却没有多少改变。在张的授意下，王、郭两君送我上电梯，我走后，他三人才出门。

不愿伤害蒋夫人

与张别后，刘绍唐又约我晚餐，为此事讨论了很久。绍唐劝我写下去。但是经验和年龄都告诉我，我只能“开个头”。其后我就去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把该馆所藏有关张氏早年的书籍、档案、新闻纪录、单篇文章，编了个参考书目，再根据其中要件仔细清查。这对一个70岁的老童生实在是个很大的包袱，所幸兴致尚好，终于写出以第一人称的海城张氏的《关内源流》和《关外定居》的两篇草稿。送请少帅增减和更正——这办法是我当年和李宗仁工作所慢慢发展出来的可行之道，我身边还保留有这两文的草稿。

可是此时在台北，我还有许多其他的杂务要处理。因为远居异国，国内有许多邀请，万里飞行，参加不易，多半都回绝了。然既来了一次，顺便在同一地区，多参加几次学术会议，也是难得的机会嘛。此时在香港和内地，我就接受了两个学术邀请会，需要参加。再者，平时到各地旅行总是三五天的事。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里，刚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1990年1月30日）他就以91岁高龄去世了。他的子女原都住在海外，各有工作。求医侍疾，来去匆匆。我助理后事也就责无旁贷了。所幸我于此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请退休。再者，岳丈死后遗留有

房子、汽车、司机和阿妈，订有合约，一时也辞退不了。我被迫鹊巢鸠占，在台北就做起“汽车阶级”来了。这时我也曾到张家请益，并把我的底稿送请他过目以便修正。当我车抵张府时，那个在张家门外巡逻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开门让我进去。这大概因为我岳丈的汽车上有一张“总统府通行证”的关系。这就使我想起，我的学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张府门外被警卫驱逐的故事来。还是苏秦说得好：人生富贵岂可忽略哉！无车无马，怎能私闯公门。

张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后，虽也不无赞词，但是他说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称（first person singular），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这一来，那便和《李宗仁回忆录》大异其趣了。

“为什么呢？”我不免好奇地问他。他解释说，他不愿伤害蒋夫人，蒋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许多话，在蒋夫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不愿“直说”，只希望我让他以“第三者口气”发言。

其后张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来约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谈笑餐叙了好多次。这时通过一方母亲的叙述，张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过世的父亲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吴开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属于国民党的 CC 系，真是西谚所说的“世界太小”。

哥大东亚所愿为张传担纲

我这“第三者口吻”改动的工程不小，身边既无书记，也缺少足够的时间，我就到香港和内地开会去了。一去经旬，回台时已耳目一新了。这时张公已获得人身自由。当局为宣布此好消息，并要为他举行个九旬大寿的庆祝会，需要九十位“发起人”。张公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了。当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时，我为之大惊，问他能否将我的名字删掉？张公还惊问何也？我说少帅九十高寿，在台湾纵列出个两百位发起人，也轮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会惹起宝岛政学两界不必要的反应。张公还笑我多心，连说不必顾虑。

果然就在此时，台湾报纸登出了我为张公作传的惊人消息，北京的报